

宋庆龄为捍卫新三民主义 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朱 汉 国

美国作家斯诺夫人在回忆宋庆龄的文章中写道，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夫人“照她的性格来说，她是应该受到孙中山保护和爱怜，而不是要投身去为孙中山战斗的”。但严酷的斗争现实，却使得宋庆龄成了捍卫孙中山的坚强战士。^①民主革命时期宋庆龄几十年的斗争生涯正是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宋庆龄是孙中山革命思想最忠实的继承者，继承和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是宋庆龄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活动之一。本文试图从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论述一下宋庆龄为捍卫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前提。是拥护还是反对三大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这是鉴别真假三民主义的试金石，也是划分国民党左右派的主要标志之一。

早在孙中山提出三大政策之时，就遭到国民党右派邓泽如之流的反对。如果说孙中山在世之时，还能以其“总理”的威严镇住右派分子，使新三民主义得以贯彻执行；那么，孙中山去世之后，为坚持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就需要一批真正愿意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志士，去与国民党右派斗争。而宋庆龄就是这一批革命志士中最坚决的一员。

孙中山的逝世，对于宋庆龄来说，其悲痛是难于言表的，但本来就认为“与先生结合，实为与中国革命结合”的宋庆龄深知，唯有继承孙中山遗志，方能有益于革命。因此，她坚定地表示“我会继承他遗志的”。^②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大革命中，她在上海、广州不断发表演说、声明，号召全国国民要“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③“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

障”。^④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邹鲁、谢持等国民党右派麇集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开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通过了一系列反三大政策的反动决议。面对国民党右派的猖獗进攻，宋庆龄毫不畏惧，通电谴责了他们的罪行，指出“总理泉下有知，亦当痛哭”。^⑤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揭露驳斥了西山会议派背叛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行为，号召革命党人紧密合作，“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挑拨”；共同努力，忠实执行三大政策，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⑥

① 《海伦·斯诺谈宋庆龄》。《参考消息》1981年5月23日。

② 李云《三十年代在庆龄同志身边两年》。《解放日报》1981年5月23日。

③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20日。

④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6月9日。

⑤ 《宋庆龄是一位可爱谦逊的人》。《星洲日报》1981年5月30日。

⑥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13页。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公开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的背叛，并没有动摇宋庆龄坚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决心，她坚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国民党反动集团虽然背离了“孙中山手定的中国革命的道路”，但“千百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①宋庆龄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与蒋介石右派集团斗争的。在蒋介石公开反共之时，宋庆龄就和邓演达、何香凝、毛泽东等人联名通电，声讨蒋介石反共反孙中山革命原则的叛逆罪行，号召全国同志“惟有依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②同年五月，宋庆龄参加了国民党第四次大局讨论会，席间，她重申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要求“农民、工人和工商界联合起来为捍卫孙中山的革命原则而奋斗”。^③

在那政治动荡的岁月里，武汉国民党政府在急剧的蜕变，反苏反共反三大政策的气氛笼罩着武汉三镇。许多好心的朋友劝宋庆龄离开武汉，有的甚至给她准备了一艘日本船，但都遭她拒绝。七月十二日，宋子文从上海亲自到武汉，劝宋庆龄到上海与蒋介石合作，她断然回答：“不行！”^④宋庆龄对革命的坚定决心，为国民党右派所忌恨。当时的报刊曾有这样的报道：“孙夫人烛知其隐，屹不为动，反动派计无所逞，乃作为种种流言蜚语，欲以中伤孙夫人。”^⑤反动军官何键甚至派兵搜查了宋庆龄住宅，但她临危不惧，坚决斗争。亲眼目睹当时情景的外国记者文森特·希恩作了这样的描述：“孙夫人的庄严不同，那是一种比较内在的气质，她对孙逸仙的这个名字的忠诚以及对她认为应尽的义务的忠诚，能经受任何考验。……家里人的狂怒以及国际上的诽谤都不能动摇她的意志，使她向她认为错误的路线屈服”。^⑥

七月十四日，武汉政府中的假左派汪精卫步蒋介石之后决定反共，是日召开“分共”会议。宋庆龄拒绝出席，并请人代为发言，表

示坚决反对，严正指出：“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屈服”。^⑦同日，她又通过《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公开谴责国民党右派“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并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抗议国民党右派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背叛。^⑧这一《声明》遍贴武汉街头巷尾，给予了国民党叛徒们以沉重的打击。七月三十日，宋庆龄在上海向新闻界再次宣布“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与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任何党务”。^⑨再次表达了自己与国民党右派决裂的决心。

宋庆龄维护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态度，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也赢得了大家的好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曾称宋庆龄是“国民党整个左派中唯一的大丈夫”。^⑩连外国记者在事后追忆宋庆龄在大革命的经历时也发现，“廖仲恺之死，使得国民党老党员之中，除了宋庆龄外，没有谁能真正追随孙中山的新政策”。^⑪这种评价，尽管与事实尚有出入，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革命时期宋庆龄继承孙中山新三民主义革命原则的决心和毅力。

大革命失败后，为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宋庆龄在国内外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杜绝国民党右派

① 《宋庆龄选集》第 22 页。

②③ 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4 月 22 日、5 月 22 日。

④ 《宋家王朝》第 175 页。

⑤ 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5 月 30 日。

⑥ 《宋家王朝》第 149 页。

⑦ 《吴玉章回忆录》第 150 页。

⑧ 《宋庆龄选集》第 18 页。

⑨ 《晨报》1927 年 8 月 3 日。

⑩ 引自《宋家王朝》第 145 页。

⑪ 《海伦·斯诺谈宋庆龄》。《参考消息》1981 年 5 月 25 日。

利用她的名义，为他们的倒行逆施辩护，同时为了以实际行动抗议国民党右派反苏反共的行径，宋庆龄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底离开上海出访欧洲列宁和马克思的故乡。在苏联期间，她多次发表演说和声明，指出，背叛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人，绝不能“代表革命的国民党，也不能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①并试图与邓演达、陈友仁等一起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代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来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在柏林期间，她同国内坚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原则的同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悉心研究如何忠实地履行她的丈夫的‘三民主义’，以拯救中国”。^②

一九二九年，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在南京的葬礼，在离开柏林前公开声明：“我此去中国，是参加将中山先生的遗体移至紫金山的仪式的”，“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我不得不申明，我坚持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并表示“只要国民党领导反对孙先生的基本政策，我就决不参加国民党的任何工作，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③

回国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宋庆龄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她已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但她仍以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告诉人们：“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④因此宣传新三民主义并使之得以实现，既是民主主义者的职责和奋斗目标，也是每个共产主义者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职责和奋斗目标。

抗战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国民党内的明义之士已从背离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而造成的十年恶梦中觉醒，渐已表示了有与共产党再次合作的愿望。宋庆龄看到了国

民党内这种微妙的变化，从大局出发，一九三七年二月，出席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议期间，宋庆龄和何香凝、冯玉祥等一起提出了恢复三大政策的历史性建议，要求国民党尽快“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⑤宋庆龄还向与会者作了《实行孙中山遗嘱》的演说，指出“我坚决相信，如果政府能忠实地遵奉孙中山的遗嘱，并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执行他的三大基本政策，中国就能很快地从内部的骚乱与苦难中解脱出来，并且能获得全世界极大的尊敬”。并且断言，只有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⑥同年四月，宋庆龄发表了《中国当前的急务》一文，指出，三民主义“是适合中国今日国情的”，“推行中山先生的主义在今日是最最重要的”。^⑦宋庆龄的强烈呼吁，团结了国民党内的左派，影响了中派，动摇了右派，为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国民党恢复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国共双方的努力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宋庆龄闻此喜讯，“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欣然写下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她再次强调了贯彻执行新三民主义的意义，要求中国国民党切不可忘记“过去国共分裂这一段悲惨历史”，指出，“国民党同志应该谨记着，要是不顾先总理遗教，抛弃了工农大众利益，将成为民族罪人，等于国民党的自杀”。^⑧但是国民党右派集团恢复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是被迫的，它们出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压力和政治诱降下，时刻孕育着再次背叛孙中山新三

① 《宋庆龄选集》第 32 页。

② 引自《宋家王朝》第 175 页。

③ 引自《宋家王朝》第 176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648 页。

⑤⑥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第 451 页。

⑦ 《宋庆龄自传》，华光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 页。

⑧ 同上书，第 31 页。

民主主义的危险。宋庆龄在这种政治局势下，与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一起，一面积极地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一面与国民党右派违背新三民主义革命原则、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行为作斗争。

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写下了多篇文章，解释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要求大家团结奋斗，为实现新三民主义而努力。她说，“应该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惟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得到充分的发展，然后才有真正独立的中国”。^①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右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宋庆龄异常气愤，立即通电谴责蒋介石，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要求蒋介石“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②王昆仑先生在回忆宋庆龄当时为坚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巩固统一战线的功绩时说道：“宋庆龄历数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搞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的种种倒行逆施，严正地指斥了这些人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实际上是孙中山的叛徒。当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几次反共高潮之后，宋庆龄的话，冲破了‘雾重庆’的低气压，振奋了大后方的人心。”^③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再次背叛了新三民主义，抛弃三大政策，挑起了内战。宋庆龄义愤填膺，当即发表声明。她指出，“今天的国土已经没有外来敌人的威胁，但威胁却起自国内，起自内战”。“这种内战已不宣而战地开始了。解决的办法虽然困难，却是明显的，那就是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地应用它”。^④宋庆龄的严正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当时的民主人士彭泽民就发表《孙夫人对时局的主张代表了全中国人》一文，表示完全赞同宋庆龄所阐明的立场。然而，国民党却一意孤行，在背离孙中山革命的新三民主义的轨道上越走越远，结果为人民所唾弃。宋庆龄和中国共

产党人一起，坚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最终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宋庆龄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最忠实的继承者，她不畏艰险，临危不惧，为维护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这一点，她是无愧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也是无愧于中国革命的。

值得指出的是，宋庆龄为恢复三大政策，维护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不仅在实际工作中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在于她详尽地阐述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揭露了各种假三民主义，从理论上捍卫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1) 批判了汪精卫之流反三大政策的反动理论，阐明了三大政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提出的一种革命政策。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也是在确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基础上进行的。三大政策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决定着新三民主义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内容，决定着新三民主义究竟能否真正实行。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反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言论中，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极力贬低三大政策的重要意义，割裂三大政策与三民主义的本质联系。胡汉民就说，所谓政策，则是政治上的“大方针大方案”，而联俄联共不过是政策之下的一件事。^⑤汪精卫则声称，三大政策“为应付时代和环境所取的一种政策”，“时代与环境变了，政策也即随之而变化的”。^⑥

① 宋庆龄《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香港《大公报》1939年11月28日。

② 延安《新中华报》，1941年1月26日。

③ 王昆仑《宋庆龄是中国人民效法和学习的榜样》。《人民日报》1981年5月26日。

④ 《宋庆龄选集》第179页。

⑤ 胡汉民《清党之意义》。

⑥ 汪精卫《分共以后》。

针对汪精卫之流对三大政策的攻击，宋庆龄强调指出，“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政策不应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致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①在驳斥汪精卫之流反动论点的同时，宋庆龄特别强调了三大政策与三民主义的联系，她说，“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离的，孙总理直到临终不独没有改变他的主张，并在遗嘱中深望全体同志力求贯彻”。^②并一再声明，孙中山制定三大政策是“来加强三民主义”。^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前者是原则和纲领，后者是战略和策略。也可以说，“三大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工具”。^④宋庆龄告诉人们，“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离开三大政策，三民主义就缺少根本，也无法实现。

宋庆龄关于三大政策的上述言论，不仅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右派对三大政策的攻击，捍卫了新三民主义，同时也坚定了革命者贯彻执行新三民主义的信念。

(2) 揭露了蒋介石右派集团的伪三民主义，严格区分了真假三民主义。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右派集团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建立了所谓的“国民政府”。为了掩盖其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它处处假借“三民主义”的词句，混淆人们的视听，严重败坏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声誉。他们利用孙中山“建国三期”说的有关词句，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形式上统一全国之后，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并煞有介事地在同年十月抛出了《训政纲领》，声称这是“实施总理三民主义”的程序。一九二九年三月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标榜中国国民党是“誓行三民主义”的政党。一九三五年五月，蒋介石

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上更是大谈“总理遗教”如何如何。南京蒋介石右派集团所言的“三民主义”，完全是抽掉三民主义革命原则的伪三民主义。但在当时的中国，由于国内复杂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却很少有人能看清他们伪三民主义的本质。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在对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态度上则是错误的。瞿秋白、李立三等一些当时的中央负责人都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碍。这种错误的看法直接关系到他们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态度。他们看不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作为革命纲领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最低纲领的相同之处，分不清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与南京蒋介石右派集团所宣扬的“三民主义”的本质区别。他们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成为“公共垃圾箱”，^⑤与蒋介石的“三民主义”没有区别，甚至把蒋介石说成是“孙中山主义的嫡传”。^⑥

中国共产党内这些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错误认识和宣传，更加模糊了人们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正确认识。此时，宋庆龄却能明辨是非。从这一时期她发表的演说和声明来看，她能严格地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三民主义”区别开来。宋庆龄严正宣布，蒋介石右派集团所鼓吹的“三民主义”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⑦她告诉人们，蒋介石右派集团“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⑧“过去北洋军阀政客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

① 《宋庆龄选集》第 19 页。

②④ 《宋庆龄抗战意见》第 28 页、第 13 页。

③ 《宋庆龄选集》第 25 页。

⑤ 《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十二期第 119 页。

⑥ 《布尔什维克》第四卷第三期第 172 页。

⑦ 《宋庆龄选集》第 18 页。

⑧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第 726—727 页。

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来了”。“孙中山的遗嘱连一天也没有真正实行过”。^①这一针见血的语言，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右派集团的伪三民主义的实质，维护了三民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也提高了人们对蒋介石右派集团的认识。这对于团结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揭露蒋介石政府的法西斯暴行起了积极的作用。

(3) 驳斥了叶青等人对三民主义的歪曲，坚持了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

一九三九年前后，中国政治思想界展开了关于三民主义问题的争论。这是一场关系抗战事业和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争论。在这次争论中，共产党的叛徒、反动文人叶青连续抛出了《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中国政治问题》、《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革命》等小册子，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全面篡改歪曲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成为国民党右派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战线上的急先锋。他割裂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之间的互相联系，取消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说什么“民主在现阶段的今天，不论是抗战前，抗战中，抗战后，都非大问题”。^②他还极力歪曲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鼓吹“和平转变”，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从理论上向共产党的进攻，维护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起，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明了共产党人关于三民主义的基本观点。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宋庆龄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和抗日的民主团结，为了维护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驳斥国民党右派的假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参加了这场关于三民主义的争论。

宋庆龄首先驳斥了叶青等人借三民主义

进行反共的理论。她指出，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停止宣传和放弃阶级斗争的政治纲领”，是“无理要求”。“宣传阶级斗争正是共产党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它怎么能放弃这些呢？”她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已尽了最大力量来保持中国团结”的事实，警告国民党“如果愿意遵循孙中山联合工农的政策，它决不应拒绝共产党在救国工作中所给予的帮助”。^③虽然宋庆龄未能象中国共产党人那样明确地讲清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但她以特殊的身份公开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这对于企图以“三民主义”来要求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放弃共产主义的宣传的国民党右派无疑是有力的反击。

其次，宋庆龄强调了三民主义之间的互相联系性，批驳了叶青企图取消民权主义的言论。她认为，三民主义是一个整体，“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是有联带关系的，是救国目标中不可分离的部分”。^④并且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阐述了三民主义内部的互相联系。她说：“假使没有得到民主的权力和经济上的改善，则无力抵御外来的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假使我们没有抵御外来的侵略，则处于次殖民地地位的中国，永远不能建立一个新时代的国家，给予民众以政治上的平等和生活上的改善。”因此“我们要晓得，抵抗侵略，提高民权，改善民生，有同样的重要性，应该同时并进”。^⑤她还特别指出，如果说三个主义硬要在今天分出次第来实行的话，那么“照我看来，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实现总理的民权主义”。^⑥

宋庆龄在关于三民主义的争论中，自觉

(下转第48页)

① 《宋庆龄选集》第53页。

② 叶青《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

③ 《宋庆龄选集》第116—117页。

④⑤ 《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香港《大公报》1939年11月28日。

⑥ 《宋庆龄抗战意见》第13页。

在着的概念化毛病，但大多数作家则能超越这一点，这是新时期现实主义作家明显的进步之一。

以严峻的态度面对现实，不幻想，不粉饰，不给理想主义留下一席之地，从而迫使人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陷入富有革命性的沉思。这是张弦的现实主义艺术的特征之一。如果说，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结尾中还留有一丝粉红色的理想游魂；那么，懦弱的良蕙无法追求活生生的幸福而只能向死者倾诉、善良的孟莉莉守住了丈夫却守不住他的心、纯洁的玉洁最终还是摆脱不脱红丝线的牵连、尹影追求自由却又陷入了生活的困境……这些妇女面临的丝毫容不得理想色彩的严酷现状，迫使每一个读者不得不作这样的思考：我们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中？封建主义究竟是作为制度的外物，还是存在于每一个正直的人心灵深处的积淀物？张弦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在探讨国民性弱点的命题上显然有了新的发展。再看王安忆，在她的笔下，追求本色几乎成为一种特色：本色的女孩、本色的市民、本色的农民，王安忆没有幻想，她始终执着地盯着现实中的这一个。心眼实，口齿讷，思维简单，心灵与行为一样的麻木和平凡。王安忆适合描绘庸常之辈，她不赋予人物半点理想色彩，不在灰色上涂抹一点红，而正是在这种为芸芸众生绘像中她展示了充满生机的现实世界。《小鲍庄》的多义性正证明了这一点。

张弦与王安忆的现实主义创作不是当代文学中的偶然现象，它反映了文学挣脱了过去伪现实主义强加于它的种种枷锁以后，又活泼泼地恢复了现实主义的生命力。这种略带一点阴柔之气的创作之风配之刘宾雁式的雄风，构成了新时期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特点。它不奢想排斥其他创作流派与艺术技巧，也无有企图包容其他创作流派统领一切的野心，它只是以现实生活对作家的有力制约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本能关注为生存的基点，发展着自己的魅力。新时期文学较之昨日的文学，它的进步仅在于文学在社会学上的功能略有缩小，其审美功能始有萌芽，但还远远未达到仅供人们陶冶心灵的程度，物质基础的不雄厚，社会弊病的积重难返，封建意识的僵而不死，都会促使人们向文学提出现实主义的要求。依我看，今天的文学当分饥饱之需，“饱食”文学反映了人们在物质要求获得满足以后产生的精神渴求，“饥食”文学，反映了人们在追求物质欲望过程中所伴随而来的种种精神渴求。两者功能旨向，其价值尺度，都不一致。而在今天，建设“四化”还仅仅是一个开头，人们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改革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之时，现实主义的文学依然是满足“饥食”文学的最好精神食品。

也许，现实主义不再是作家的宗教，而成为作家的工具、向导、朋友，它伴随着作家共患难，冒风险，一起开垦着未来的文学园地。

（上接第75页）

地与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一起，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三民主义的歪曲，维护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澄清了在三民主义问题上某些混乱思想，这对保证中国抗战的顺利进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宋庆龄始终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决捍

卫者，是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旗帜的杰出代表。她不为反动逆流所左右，在血雨腥风、危浪险涛中巍然屹立，坚贞不渝地捍卫新三民主义，为新三民主义所期望的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幸福与国民党右派作了坚决的斗争。这种坚持革命原则，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足为全国人民同钦。